

社会科学

第五卷 第一二期

一九四九年

社會科學

第五卷

第一二期

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編行

福建福州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

社會科學第五卷第一二期目錄

論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階段.....	章振乾(1)
傳統自由主戰的沒落.....	杜邁(6)
中國海外貿易商經營者之地區分佈的研究.....	傅衣凌(14)
英屬殖民地的土地制度.....	解樹兵譯(19)
明清時代福建的鄉族組織.....	胡寄馨(27)
轉形期中的中國基層政治.....	管長壙(37)
閩海與閩南的械鬥.....	鄭道傳 管長壙(47)
論福建宗族土地.....	鍾其生(63)

論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階段

章 振 乾

社會科學的研究，原是意味着社會現象之科學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除却把中國社會來個科學的研究之外，也並沒有特殊的意義。科學的研究，目的在於原理原則的探求，問題徹底的把握；它是不同於政治政策的厘訂，厘訂政策所考慮的，主要是執政者或執政集團的主觀要求，如何通過客觀的形勢來實現的問題；它是隨時因環境的變動而斟酌損益的。而科學的研究則含有比較濃厚的客觀性，獨立性和繼續性。這幾種的性格，使它能够超然於社會上各種的變動而向前發展。

不過，社會科學之超然於社會的變動而發展，並不使社會科學離開了客觀的現實，祇是使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至為紛雜的社會現象所蒙蔽或困擾而已。作為科學之一分支的社會科學，對於複雜無涯的社會現象，一般是藉助於科學的方法，尋找出客觀的運動法則，把握其規律性；從而闡明各種社會事象的叢結——其關聯，發展及其歸趨，使基於社會科學的認識，不僅包含有濃厚的正確性，同時也包含有濃厚的啓示性。作為科學，它能夠指出被現象所籠罩的本質；作為社會科學，它更能指出，由本質認識所引伸出來的健全的發展方向。社會科學是這樣的担負着有助於社會進步的功能。社會科學儘管擔負着有助於社會進步的功能，但並無礙於其客觀性，獨立性的完整；我們實際還可以說，正因為它擔負着前述的功能，它才必然的要排除主觀的和外來的一切塵霧的侵襲，來保持其客觀性和獨立性的。這樣，基於社會科學，我們對於社會的現實，才有深切瞭解的可能；同樣的，基於社會科學，我們便更瞭然於人類已經到達了，能夠創造其自身歷史的階段。

社會科學既以尋求法則，襄助進步為其任務，則它在各種具體的環境裏，隨着社會進化的階段，而轉移其研究的重點，就實是一件必然的事。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既然是中國的社會；那末中國社會科學新階段的研究重點，也必然要有中國社會發展階段上的依據。中國的社會，現正處於轉形的末期，舊有的生產組織，正在解體的過程；社會生產力的進展，亦正蒙受到深鉅的困厄；整調的社會，正起着以此為基因的劇變。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實況。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應以此來奠立其認識的基礎，並以此來確定其有裨於變革的實踐；這樣才會使其本身趨於健全，並達成主要的任務。

一切關於多數人民切身的感覺，以及基於此種感覺而起的希冀，往往都反映着一部分的真理。比如，眼前隨處可以聽到這樣的聲響：「中國的人民，普遍的遭遇到空前的苦難；和平和建設，為人民一致的要求」。不管這話是如何的直覺與天真，而在社會科學的理解上，却有很大的意義。前述的「苦難」，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被註定了的運命；只是在今天，它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來無情地戕賊着人民而已；而前述人民大眾的素朴的要求，也適與社會科學觀點上的排除那種「苦難」的實踐方向相符合，不過基於直覺的要求，在以往，什九均為庸俗的，常識的方法所困囿，因而造成許多無補實際，甚至與人民要求相背的後果，這是中國近一世紀歷史上隨便可以舉證的，值得吾人警惕的一件事；因之，吾人必須以科學的方法予以替代。社會科學所不

同於常識，是在它處處以科學的成果為依歸，正確而深邃地透視着現實的中心。

把前述的意義展開來看，中國人民所一致嚮求的和平，必然是意味着新舊特權者的消滅，封建剝削的長除；所謂建設，則是意味着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前述意義的和平和建設，其實也就是民主和科學；因之實現和平建設的有效途徑，也就是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澈底發揮。實際上，和平和建設，民主和科學之間，也存在着有機的聯繫；顯然，在今天的中國，已不難體會到，不民主便無從發展科學，沒有科學也就無從保證民主了。如何以社會科學為根據，來實現全國人民求和平，求建設的願望，要成為中國社會科學者當前研究的重心。

只要吾人進一步的加以考察，還不難發現中國今日所需要的和平和建設，其性質是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的同種的需求。中國長期停滯下的社會，基於生產力發展上的要求，隨着封建王朝的更迭，雖然也曾經實現過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和平和建設，不過以往的變革，絲毫沒有例外的，建基於中國型的封建土地關係上面，生產的方式，技術的水準，上層的建造……幾乎都在原封不動的狀態，和平和動亂，建設和破壞，祇呈現出一種寒熱病的循環，那種循環，愈到後來，其所帶來的災難便愈形深鉅，因此，今天中國社會所要求的和平和建設，決不是以往那樣可以坐待得到，但不能由主觀的力量來予以延續的和平和建設，而是一種毀滅妨害和平和建設——民主和科學發展的社會的根基。這顯然的超越任何常識的範疇；可是以往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也顯然沒有配合着中國社會發展上的這種實際需要，就因此故，今天中國社會科學界，已經面臨了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的考驗。

二

如前所述，中國人民「苦難」的成因，應溯源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要使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夠成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武器，那末首先必須注意一下，這類武器器材的選擇與磨鍊，以及武器所有者運用這種武器的態度和技術；看看它是否以及如何才能有助於它底任務的遂行。

由於社會互數千年的停滯於封建的階段，嚴格意義的社會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和成長；一切以社會為對象的學問，大都帶有濃厚的「官房學」的氣質；一切接觸這些學問的人，也大都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成為專制帝王或封建統治者的謀臣和策士；他們的任務，究其極是引經據典的，來替他們的主子設籌控制人民和駕馭人民的「治術」，以遂其奴役人民，榨取人民的目的；他們所講求的方法以至技術，都以剝削人民，支持封建統治為依歸。顯然的，當前的中國社會，尚有不少屬於這種類型為「社會科學家」。由於同種的原因，嚴肅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往往也到處被認做「優異」於上述勾當的策士與謀臣，使他們有痛苦與倒置之感！但這還不是嚴重的現象，值得吾人痛心的，倒毋寧是一些頂着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牌子，假借和平，民主一類的動聽的名詞的，大小封建魔王實施封建陰謀的新式的設計者和助成者！我們必須鄭重的指出，以上這些所謂的社會科學及其研究者，與嚴格意義的社會科學及研究者，並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我們也必須指出，以外國社會為背景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科學，並不可能無條件的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特別是意圖掩飾資本主義的破局而建立的一些社會科學的「理論」，它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決不止於「鑿孔栽麟」！這些理論的推演，會遲鈍甚至毀滅中國人民求解放的情緒，是帝國主義加深殖民地化的文化武器，這是值得吾人隨時警惕的。不幸在今日，這一類的社會科學及其研究者，仍是散布着全國的各角落，在在擴大其影響範圍。抗戰前頃日本人基於國際分工合作的「理論」，提出了「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口號，當時社會科學界雖然也發現有一些職業的應聲蟲，但卻遭大多數人們的反對；而在今天，當「美國工商界計劃以工業產品輸華時，須自中國取得若干原料」這一類的意見提出時，却反而博得中國社會科學者的同情贊許，而昌言須設

法予以配合！（註一）這是一個多可怕的訊號呀。

我們更須指出，以上兩種同樣屬於不健全的有害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在中國還不是大家各行其是，在其對於封建秩序的維持上，二者充分的表現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結合；實際上，任何一個封建的首領，都會運用外國式的統制技術了；而在對抗新興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上，則無在而不發揮其頑強的並肩作戰的精神。吾人不難從社會科學上兩種體制的互相結託中，窺見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這兩種不同的性質，所以能夠統一在中國的社會而共同維持堅韌的落後性的理由。

以上兩種屬於庸俗的應付，盲目的建設或落後成分的助長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既有害於中國社會的改造，吾人便不能不轉而寄託希望於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了；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由於它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師承着客觀的批判的研究傳統，運用科學的理論的解剖刀，給予研究對象以無隱諱，無保留的剖析，它照理是可以大有助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的。在理論上，這種講法是對的；而在事實上，由於以往主觀努力的一般的不夠，所以一般的成就也顯得不夠。這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們儘管天天喊着要社會科學中國化，但我們認真的依據理論，建立以中國社會及其歷史為背景的科學研究這工作，我們卻做得過於有限；而且，誠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所有這些研究，彷彿有個共同的缺陷……似乎其研究的旨歸，不在說明我們的經濟現實，而是在用我們的經濟現實，去證示經典中的一鱗半爪的有關的提示。」（註二）這樣，我們便不免流於教條主義或形式主義，教條主義或形式主義，是絲毫無補於中國社會本質的說明的。

其次，作為新興社會科學研究的特色之一，原為其着重理論的探討；它藉此清算了盲目的，庸俗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枝節應付的傾向，使社會科學從維護舊秩序的社會百科全書中獲得解放。不過一種新的缺陷却似乎因之而起，那就是研究者多半儘在理論當中兜圈子，而不願依據理論的指示來走路。儘管他們所談的是些實踐性的理論，是屬於實踐的指導原理；但由於過分忽略了與實踐理論有關的許多社會的現實，以及若干技術性的問題的配合，因此其理論便不免流於空疏，而無裨益於中國社會進步的實踐了。

再次，作為改造社會的武器的社會科學，處於轉形末期的今日的中國社會，應如何的運用研究的成果來服役人民，並應如何的來加強研究，藉以減輕社會改造過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這顯然是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應有的課題。可是我們的研究者，對於這些工作，也做得過於不夠，而且有許多地方，且顯得相當的脫節；這末一來，不僅不能拿研究的成果，來領導改造社會的實踐，甚至使研究的工作，遠落在社會進步發展的後頭。

因此，扭轉社會科學研究的趨勢，並加強其進展，實為現階段中國社會科學界迫切的要求。

三

針對着社會改造上的前述的需要，我們必須使現階段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走向一條嶄新的道路。作為新階段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特徵，在原則上，其一，是要使它從教條主義中得到解放，成為中國的社會科學；其二，是要使它從單純理論的樊籠中解放出來，成為中國社會改造實踐的指針；其三，是要使它從御用的，庸俗的窠臼中得到解放，成為人民的，並以服役人民為職責的真實的科學。我們試分別的予以說明：

就第一點說，正確的理论，必須配合着具體的環境來研究，然後這種理論才能夠在那種環境裏生根，其成果才能夠成為可以指導實踐的原則。我們覺得在以往，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在用於中國實際問題的分析上，往往有籠統空疏，貌為比附的毛病，由於這種的毛病，在許多資料的處理上，社會性質的認識上，都曾經發生過不少牽強附會，指鹿為馬的事體；因之我們務必把正

確的理論，溶化在中國具體的環境裏；換言之，便是加強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這樣才是中國今日所需要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同時，

就第二點說，社會科學中國化，其目的是在於加強中國社會的認識；不過把中國今天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滯留在加深中國社會認識的階段，那顯然是不夠的；爲使社會科學的研究能與今天中國社會改造的要求相配合，我們便應當以前述的認識爲基礎，把它推進到實踐的領域，換言之，那便是依據社會科學，指示出中國社會改造的具體道路。以往中國不依據社會科學的實踐的嘗試，曾經引致重大的失敗，這是不足爲怪的；但這並不就表現着，中國社會對於依據社會科學的實踐，會無條件的予以接受。着眼於健全的實踐，我們不僅要依據社會科學，指出中國社會改造上所應走的路；還要依據社會科學，考慮這條路徑的有效的走法。接着，

就第三點說，中國社會改造之最終的目的，是中國社會性質的改變，是把中國社會從封建特權者，官僚買辦階級手裏，轉移到人民的手裏，使中國的社會，成爲中國人民的社會。這是一件旋轉乾坤的大業，這一事業的舉措，除却加深中國社會的認識，指示中國社會改造的方向之外，應當進一步的從事於改造道路的鋪設。在目前，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中國社會改造的需要，與中國人民主觀的要求已經完全打成一片，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否服役於人民並進而從屬於人民，便是社會科學是否有助於中國社會改造的試金石。

四

爲求與社會科學研究上之中國的，實踐的，人民的原則相配合，我向我們的學術界提出以下這些具體的意見：

第一，注意地方性的問題。研究地方性的問題，其目的不僅在加深個別的，具體的問題之認識，同時還可以給一般性，全面性的問題，以必要的印證；換言之，它不是使社會科學偏向化，狹隘化；而是使社會科學豐富化，深刻化。關於這，我們過去已經一再的提到；因爲要這樣，社會科學才不僅能夠充分的包容着中國社會發展法則的特色，並且還能夠因充分的包容中國社會發展法則的特色，進而迅速趕上先進國家的一般理論水準。（註三）因此我們的研究方針，必須放棄了以往捨近圖遠的傳統；要在總的原則之下，把握理論的武器，從事於地方的，個別的問題之精密的研究，這樣才可以動員更多的研究者參加研究，更多的問題被提出研究，然後中國的社會科學的研究，也才會有劃時代的收穫。

在研究地方性的問題當中，我們必須注意到以往所未經注意的地方，如像參考舊文獻一事，以往我們對於各地各種地方誌，族譜，帳簿，契約，筆記一類的資料都不很重視，因爲這些東西多半缺乏科學性和系統性；但一概置之不理，却是一種不必要的偏見，因爲那裏面往往是體現着文化的遺產，詳加整理考察，一定有不少有助於研究的東西可資發掘。當然，這只是一個例舉而已。

第二，注意建設性的問題。具體的建設問題，我們在過去是不大提到它。這是不足爲怪的，因爲不僅依據社會科學的認識，任何建設，都必須有這種建設所具備的社會條件，才能行之有效；即依據我們一世紀以來的建設（如工業建設）的經驗，我們也深感到過去這一方面的嘗試結果，都祇付出了代價而沒有收穫。可是，事實雖然如此，我們却沒有理由因而一輩子不講建設，因爲環境是朝着進步的方向發展，我們的研究，是不允許久滯在向來的地方。況且在今天，我們有理由假定中國社會制度逐漸步上現代化的常軌，對於社會科學成果之接受，也將逐漸成爲可能。這末一來，我們的具體的建設性的問題的研究，將成爲必要的，配合準備的工作。假如說，地方性問題的研究，是幫助吾人更能瞭解客觀的現實，那末建設性的問題之研究，便是依據客觀現實的指示，給予中國社會改造的具體步驟。

在從事於建設性問題的研究的時候，吾人必須牢牢地把握着建設之階段的性質，建設固然要具備各種應備的條件，建設更要有建設的步驟。我們過去談建設之所以顯得處處失敗，其原因固在沒有看清中國社會的性質，但把建設的項目作平面的鋪陳，沒有把握其邏輯的程序，也是一種致敗之因。任何一種的建設，假如不顧及它的階段性質，結果必然把項目紛然雜陳，不分主從緩急的來實施，其成功的希望也就大大的減低了。把握階段性，它在學術上乃至社會上之積極意義，是藉以減輕變革的痛苦，縮短建設的行程。目前土地改革之所以要從減租或「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着手，發展工業之所以要注意手工業生產合作，也就是把握階段性的一個說明。

還有，社會科學的研究，原不能憑空從事的；建設問題的研究，更不能憑空從事，在從事建設問題的研究當中，實地的調查考察，將成為不容輕忽之事。我們過去似乎還不是不重視調查工作，而是因調查方法的不夠「中國化」，它所能幫助顯示中國社會實況的地方並不多。今後我們必須從調查實踐中磨鍊適合國情的調查方法，不僅注意中國社會中的死板的情況，更要把捉其時刻在着變動的情況，這樣，才能配合着建設的研究。

自然，建設問題當中，可能而且必然內在着破壞的問題——為建設而必須破壞的問題。足資我們借鏡的，將不僅歷史上的事實，更必須是同時代的資料，對於一些有合理的社會組織的先進的國家，在其建造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對於困難的克服一類的寶貴的經驗，是大有助於吾人之建設的參證的。

第三，注意技術性的問題 技術性的問題，在社會科學研究上，一向是被列為無關重要的部門。但這是就它與社會性的問題對立起來講的，因為許多庸俗的學者，正企圖着用技術性設施，來代替社會變革的要求。但是，着眼於社會改造實踐上的需要，技術的配合，是不能一輩子置諸不理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為使其研究獲得最新的，有現實意義的材料，並使其研究更能接近於其懸擬的目標，單純靠着書本，單純靠着調查，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進而設法參加生產以及改良生產組織的工作，藉使學習的園地得到新的開拓，研究者向社會學習，向人民學習的結果，將使自身不斷的吸收有用的技術性的學問，來充實自己。這樣，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配合中國社會的需求。因為技術性問題的注意，可能使中國社會改造的理想，迅速地具體化和實現化的。

我是這樣的提出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階段及其任務，我虛心地期待着學術界的評正與補充。

自然，這些方式的研究，還不是到處可以實現的。它需要有某程度的學術研究的自由為基礎，並且可以逐漸擴大學術自由研究的領域，和保衛學術的自由研究的環境。而這在中國，究能在多少的地方來從事呢？

因此，我覺得學術研究的自由仍是社會科學界當前所應爭取的目標。

（註一）參見福建省四位經濟學教授：論農業在經濟建設的地位（福州中央日報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星期論文）

（註二）參見王亞南：我們需要怎樣一種新的經濟學說體系（本刊第四卷第一期）

（註三）參見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工作新計劃綱要（本刊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

傳統自由主義的沒落

杜 邁

十九世紀是自由主義勝利的時代；從一八一五年滑鐵洛（Waterloo）戰爭終了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百年中間，自由主義的巨潮淹沒了整個歐洲大陸，浸透了整個美洲，而且還波及遠東的日本和中國。在這一百年中間，實沒有任何別的學說能具有與它同樣的權威和廣泛的影響。

就歐洲而論，儘管大陸各國在一八一五年拿破崙第二次興起被聯軍徹底擊敗，維也納會議倡出「正統主義」（Principle of Legitimacy）後，反自由主義運動的封建專制殘餘勢力曾猖獗過二三十年的光景。但是所謂「正統主義」的提出終只是封建專制統治的迴光返照，就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梅特涅（Metternich）為領導的歐洲反自由主義同盟終為自由主義的巨潮所粉碎。

自由主義能於十九世紀上半期有如此輝煌勝利的原因，主要是歐洲的產業資本已在這時取得了對封建經濟和商業資本的優勢。發軔於十八世紀末期的產業革命，到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已完全成熟，工業資產階級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已正式建立；在政治上，他們要求全而控制國家權力的活動，在經濟上要求徹底清除一切阻礙工商業充分發展的拘束。一句話，他們要求控制國家權力，並使這社會最高強制權力的活動完全服從於他們的財富目的。這時他們已有了這種控制的自信，乃起而以行動去掃毀封建專制統治的最後堡壘。

當然，這一發展進程並不是在所有近代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同時出現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如德國和意大利均晚於十九世紀下半期才真正進入這新階段。俄國則更晚，而且自由主義在俄國始終都沒有成為一強大的運動。自由主義在這一階段中發展的意義，我們可從英國的事例中看得最清楚，因為產業革命是開始於英國，這時期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最為迅速，所以，我們可視自由主義在英國的發展為近代自由主義發展的典型。

法國大革命也曾在英國引起一短時期的反動，資產階級的進步改革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仍無甚巨大成就。在政治上，資產階級還沒有進一步突破十七世紀清教徒革命後與地主貴族階級妥協而形成的權力均勢。地主階級在十九世紀初期仍能假手於國會立法以維護其己身利益。其中最有名的一項國會立法為「穀物律」。政府根據這一法案，嚴禁外國糧食原料品輸入英國，非至本國糧食價格漲至相當程度，足使農民生活得到充份保障時不許外國糧食入口，以免本國糧價跌落。這一法案，名義上是想藉此以實現英國糧食自給自足政策，保護農民利益，實際上則是地主階級防護其自身經濟利益的手段。與此同時，英國還保留着某些重商主義時代的保護貿易政策，如航海律，一直到一八四八年始經國會正式廢止。

在政治上，民主政治的理想這時大部分還只是一種理想。議會選舉制度雖已早具規模，但立法大權仍操縱在地主富商階級之手。選舉雖不但有高額的財產限制以及其他資格的限制，而且還有所謂「腐爛城市制」（Rotten Borough System）以及「買賣城市」制（System of Borough-mongering）的存在。結果，多少因工業發達而繁榮的新城市，人口儘在激增，而獲有選舉權者仍極有限，而且大部份獲有選舉權者係地主富商。所以，議會代表主要係地主階級所把持。

。此外，一般政治之腐敗，行政效率之低落，人民所受刑法之殘酷嚴重以及出版言論自由保障法之徒爲具文，這些都是封建專制統治殘餘的必然後果。

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產業革命完全成熟時，工業資產階級的財富急劇膨脹，進一步的獲得慾望，促使他們必然要求消除。這項任務終於在以一八三二年之選舉改革與一八四六年之穀物律取消爲中心的鬥爭中完全實現。

產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也伴來了自由主義學說更進一步的發展；這時，自由主義可謂已達到發展頂點，而且具有了更豐富的內容。這所謂頂點的意義，我們可從邊沁（Bentham）的功利主義中看出。有人以爲邊沁的功利主義以及隨邊沁哲學而起的曼徹斯特學派哲學當原於激進哲學（Radicalism），而有別於傳統自由主義（註一），實際上這種分別是頗爲勉強的；論源流，所謂激進哲學只是自由主義的發展在產業資本主義取得對商業資本的優勢以後的必有表現。我們於對邊沁以及其他激進學派的思想作一粗略分析之後，即不難明白此中源流關係。

在邊沁以前，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的辯護，大都係根據自然法這基礎。以自然法爲自由的辯護基礎，在十八世紀以前總可有恃無恐，可是在十八世紀以後，則已暴露出了兩個主要的弱點，足引起自由主義哲學基礎的動搖。第一，自然法根本只是一種沒有歷史事實作基礎的理論假設，歷史上並沒有過真正的自然法；用歷史方法作研究基礎的著作家已經嚴正地指出了這事實。所以，對個人自由的辯護如果仍放在自然法的基礎上，這時顯然已不甚穩妥了。其次，就資產階級本身而言，這時自然法的引用已成了有利同時有害的武器了。自然法可以作爲辯護私有財產權的根據，但也可被人拿著作爲攻擊私有財產權的憑藉。這種可能最早是出現於於十七世紀英國清教革命時代的社會思想演進中，革命期中的急進派都利用自然法來辯護他們的平權學說和消滅私有財產的主張（註二）。及十八世紀，自然法更爲一般空想社會主義者據以爲辯護其共產學說的基礎，他們要求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即常憑自然法而振振有辭。如此，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實不能再單靠自然法來作爲反封建殘餘的有利武器了。這時，在他們的眼前，資產階級背後的掘墓者——無產階級的陰影正因工業制度的成熟而冉冉升起於地平線上了，他們正準備檢起爲資產階級利益辯護人所慣用的自然法這武器揭起對資產階級的挑戰。所以，自由主義理論家不能不找一新的解釋來解決這一矛盾，使自由主義本身能立於不敗之地；一方面牠可用來繼續反封建的鬥爭，一方面又可抵擋一下社會主義者所揭起的新的自由戰爭。邊沁正挑起了這新任務，他的功利主義正是爲填補這一漏洞而提出。

亞丹斯密的個人主義哲學是發源洛克（Locke）的自然法理論而成。在他的哲學裏面，個人與社會相等的，而且又是完全一致的。個人利益如何能與社會利益一致呢？亞丹斯密說是靠一隻「看不見的神手」在暗中的巧妙安排，即所謂「自然的和簡單的自由制度」。不過，在亞丹斯密的樂觀主義中所假定的一切的個人可在自由競爭中成功自己的利益的說法終只是一個過分樂觀的假定，因爲事實上，自由競爭的結果，由於各人在社會財富分配關係中所處地位的根本不同，社會上有大多數在這分配制度中處於不常地位的人總注定要失敗。失敗的人怎能不懷疑這自然制度的安排呢？邊沁出來明白地指出：對個人於其社會生活經營中最重要的，是他最能判斷他自己的福利是什麼（所以邊沁學派很注重普及教育，詹姆士·穆勒 J. Mill 還幻想工人夜晚回家後能讀休謨 Hume 或邊沁的著作）。他將亞丹斯密的個人主義作更進一步發揮，認爲個人是高於社會。社會利益只能在個人利益的充分實現中才能有完滿的表現；個人是高於社會之上的，唯有個人的利益才是真實的利益。個人利益是什麼？是尋求快樂而避免痛苦，就是在爲自己追求最大的福利。社會的利益從何而來？因爲社會是個人機械的總和，是以將個人的福利機械地總加起來便是社會的福利，用邊沁的公式來說，即爲最大多數個人的最大福利的總和等於社會的最大福利。如何能求得個人的最大福利？邊沁說，讓各個人在任何場合下有最大可能去自由活動，因爲他自己是自身

利益最適當的判斷者。所以，個人須有最大的自由，國家的限制作用只能限於消極的方面，即實踐其「警察國家」的任務。

邊沁在這裏並不求救於自然法，他根本就否認自然法的存在。

資產階級自身在財富追求上，已經有了雄厚的本錢和機會，而且有充分的勝利自信，他們不怕任何競爭，而只怕這競爭不能有充份的自由。這種不能自然最可能是來自國家權力的干涉；在地主階級的勢力仍未衰的情勢下，這個國家仍可能被他們利用來演出一套「與民爭利」的干涉政策，或國家被妄想平等的力量所影響而用強制權力將自由競爭的本錢和機會平等地分攤給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如英國清教革命中的平權派和掘地黨以及法國大革命中的巴比夫和瘋人派。這種妄想社會革命的力量每一個世紀都有，而且他們的力量愈來愈雄厚。所以，自由主義者們現在決心不用平等的招牌了。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大都重視自然法，自然權利之不可讓與並不可分割，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係來自契約的說法，邊沁則予以全盤否認。他認為國家的基礎不在同意，國家係產生於服從的天性；至於不可分割並讓與的自然權利說，他認為那根本是一種「浮誇的無稽之談」，人民的權利均係來自法律的賜與或為法律所承認。平等呢，邊沁說：「平等是靠不住的，平等的原理本就很滑稽」。我們承認，邊沁對國家起源於契約說的否定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國家的出現原是人類社會有了階級分化以後的事，國家權力是階級征服的產物，並非出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契約關係，也不是由社會全體共同成立契約才產生國家和政府。但國家也不是產生於人類的服從天性；把國家的產生解釋為人類的服從天性，這只是邊沁為資產階級行將升入統治王座所作的一種準備。同樣的準備功夫也表現在他對人民自由權利的解釋上；被統治者所有的權利，都是來自法律的賜與或為法律所承認，這一理論的強調自然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的。法律的標準是什麼？標準就是牠所能產生最大多數最大福利的程度。這樣又還原到邊沁的個人自由原則了。

邊沁拋棄了他以前自由主義所有的舊的理論依據，而另外給他換上了一個比較牢固的基礎；他拋棄了平等的理論，而只片面地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將自由主義的整個重心放在個人自由的最大保證上。雖然他並沒有明白地或斷然地否定平等，但他已很巧妙地避開了平等的問題。資產階級以前曾很熱烈地倡導平等博愛的理想，現在他們就這樣很輕易地逃避了平等的責任。

既然個人在社會生活經營中的目的是在追求他個人的最大福利，而完成這種追求的條件就是予個人以最大可能的自由，自由主義即為個人充分地提供這項條件的保證，則自由主義豈非即千古不易的自由真理嗎？封建社會是根本不能提供這種保證，社會主義也不能保證這種條件的必有，因為他是主張將自由的本錢和機會用國家強制權力平等地分攤給社會上每一個人，在自由主義看來，強求一律就是戕害人民的自由。「自由史」(History of Liberty)的英國名史家阿克登(Lord Acton)說：「追求平等的熱情，使我們對於自由的希望成為泡影」。的確的，傳統自由主義實認為自由與平等根本是不相兩立的；有平等即無自由。

這種自由放任的教條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已發展到了一種可笑的程度。那時有一個代表邊沁學派主張的「經濟學者」(Economist)雜誌對國會所通過的「公共衛生法」也施以嚴厲抨擊，對一切改良工廠中勞工生活的立法則更是反對不遺餘力，認為這些立法全是摧殘個人自由的陰謀。這種態度也就是所謂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的態度，他們要求政府放棄一切對工商業的約束，認為任何出自政府的干涉均屬有害。這個學派原為一以產業資本家為核心之小團體。他們之所以反對各種工廠改革立法，主要原因係在於這些改革法的實行無不是增加他們的支出，從而使生產成本增加，減弱英國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二

自由主義經過了近三百多年的艱苦鬥爭後，終於十九世紀完成了一個新文化的建立；他不但

爲資本主義的新生產關係提供合理辯護的基礎，而且還在這基礎上形成了整個新的價值觀和人類社會生活的新制裁標準。他是自由貿易的辯護者；他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性的市場，消除了因遠距離而形成的貿易隔絕。他是宗教容忍的提倡者；而且他摧毀了羅馬教會的世俗權威，從而也粉碎了教會對一切足以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傳統觀念的支持。他主張國家的政治疆界應當符合於他的民族疆界，因而激起了民族主義的巨潮。他建立了普選制度和議會制度，二者幾乎成了新的自然法原理。就人類整個自由鬥爭史來說，自由主義確實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所創造的新文化使人類前途充滿了樂觀的心理。十九世紀常被人爲希望的世紀，工業技術的進步，科學的發達，使得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更爲加強了，再加上民主自由理想的逐步實現，使人們對社會生活的經營可按照他們自己的理想去處理。十九世紀的人們實生活在一個較過去要舒適得多的新文化中，人類的精力第一次找到充分發揮的機會，在工廠中，在無邊無際的田野上，實有到處獲得幸福的可能，如果自由主義所標榜的一切主張都能充分實現的話。

可是，歷史發展的實際道路竟又不然。充滿了樂觀希望的十九世紀一到了四十年代以後，就開始退色了；自由主義浪潮似乎已達到牠的潮頂，這時已進入了退潮的階段。人們在剛建立起的樂園中的遊興還只剛剛引起，但這座樂園很快就變成「樂園」了。就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自由主義的漏洞就開始爲人們所發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牠的漏洞就更擴大了，牠的合理性也開始被普遍懷疑而引起反對者的挑戰。

自由主義的破綻在什麼地方？如何遭到反對者的挑戰？在解答這些問題之先，我們不妨將自由主義的本質作一概括說明。

自由主義，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爲其所建立之新社會秩序——資本主義制度提供合理辯護的理論基礎。作爲一種社會哲學來看，牠原是一個新經濟社會的需要所形成。牠體系中最有力的部分爲個人主義；我們在考察了封建社會中被剝削階級所處不幸地位後，就很容易了解何以自由主義會將個人的地位奉爲圭臬。我們在考察了重商主義時代專制國家所施行的保育政策，到產業資本主義興起後是如何戕害着工業資產階級的財富努力後，就很容易了解自由主義何以會將國家的地位貶抑爲只是一個「必要的惡」，從而也可以解自由主義何以要強調消極的自由。

如果我們還深入一層看，這問題的真正重心還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上，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轉變的基本意義，是在經封建生產關係的保護而大大發展了的新生產力必需突破原有生產關係的桎梏才能向前發展，資本主義乃生產關係上的一新適應物。就資產階級而言，這一轉變對他們的利益則具有更真實的意義——這運用新生產方法的新興社會階級，在追求利潤的強烈慾望刺激下，他們已發見了運用這生產力以開拓無限財富的可能，必然要求清除一切足以妨礙其財富努力的阻力；這一努力的中心意義也是歸結到新生產關係的建立。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生產工具的私有，這私有即構成私有財產制度的核心；其次，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動力是利潤，資本家是在他自己的牟利慾刺激下而計劃生產活動。在這新制度下，私有財產權被放在一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謀利的活動也被尊爲神聖而不可有任何阻抑；自由主義就繞着這兩個中心而推演出牠作爲社會哲學的全部理論，建立起新社會的全部價值觀和社會生活的制裁標準。自由主義的各種觀念就這樣和私有財產權以及利潤動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歷史關聯。從這裏，我們就可理解到自由主義所維護的個人實際上只是社會上具有財產的個人，牠的自由權利，並未普遍於社會全體。自由主義的各種目的，實際上就是社會上常有財產者的目的。我們自然不否認這新文化中還有許多爲自由主義所肯定的部分，並不直接地關聯着私有財產和利潤動機，而是自具有永恆的價值；但我們也得承認自由主義對那些東西的肯定，無論如何是賦有新的意義的——即私有財產權和利潤觀念的確認。資產階級爲了建立他們穩固的絕對安全的財產權，爲了使他們無限的利潤慾能得到最大可能的滿足，他們必然要求清除一切封建制度

的縛束和專制統治的壓迫，要求除去一切社會權威對個人活動的干涉；所以，自由主義的自由理想也必然是著重於消極地解除縛束，而將個人從各種權威拘禁中解放去來。牠將個人的地位奉到高於全體之上，實因為個人在封建專制的雙重壓制下太被抹殺了。牠的強調消極自由，實由於牠從封建專制的歷史經驗中深切地體認到任何干涉，無論其目的是好是壞，結果總是利少害多，所以，牠對任何權威的干涉的合理性實不能不深致懷疑。

從此，我們可很容易看出傳統自由主義的漏洞是在甚麼地方：第一，自由主義所維護的個人，由於歷史關係，只是在他所建立的新社會中具有財產權和醉心於利潤追求的個人，牠無可避免地把他自己所服務對象的範圍大大地縮小了；其次，自由主義所建立的自由制度也無可避免地是著重於消極地解除縛束，而大大忽視了為人們積極地提供自由的機會，乃至根本否認積極的自由——經濟平等是自由的必要條件。

由於自由主義所建立的新社會，具有以上所述的先天缺陷，結果使得牠所有的標榜都大大變質了。

就自由國家中所有的政治自由而論，自由主義者均深信自由既係以法律為根據，則人民自由於獲得法律保障後，必可有充分實現；一切自由國家也無不對人民自由有限細密而過詳之法律保障。但實際上，所有自由國家中人民自由的真象只證明人民的各種自由並未因法律保障而得實現。就在十九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最盛的時候，人民的結社自由不但有了法律保障，而且是習慣了結社自由的真理而不再懷疑到這種自由還會成為問題時，英國的職工會都會被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使勞工階級失去結社自由。這只是一個極常見的例子，證明英國的公民並未因法律保障而獲得結社自由。今日以自由主義最後堡壘自詡的美國，人民的自由權利似當不再成為問題了。可是就在近兩年中，美國會特設之「非美委員會」的活動即使得美國公民失去了他們為法律所明文保障的自由；無數美國公民隨時被這保護美國利益的委員會指控為懷有反美國利益的想法和行動，而受疲勞審問，被處徒刑，或被迫失業。這證明美國公民的自由，並未因有法律保障而實現。

這問題的中心，並不在人民的自由有沒有法律的保障，也不在法律對人民自由的保障是否充分，而是在法律之創設原意旨在保護那一階級的利益。我們可從法律對財產權的規定上看出這問題真象，即在自由國家中人民的自由是否真能因法律保障而實現；因為有關財產權的法律，即為規定某一社會分配關係之法律，牠必然也決定著其他一切法律的功用。一般自由國家中規定財產權的法律，是確認私有財產制度，確認利潤制度，即保障財產所有者之財產權，保障利潤追求者的利潤要求，使他們能有絕對安全，使他們的發展有最大可能的自由。自由國家中，所有其他法律即以此為中心；甚至我們可以說，所有其他法律之存在，基本功用即在使有關財產權之法律能有效施行。因此，法律固是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權利，但只有當這些自由權利的實現不致危害到私有財產權利利潤制度安全時，人民的自由權利始能獲得法律保障。反之，當人民自由權利的實現一旦與私有財產制度和利潤制度有衝突時，則法律必然犧牲一般公民的自由權利而以維護財產所有的財產權和利潤要求。

以上所舉英美兩國的實例，正說明了自由國家中法律保障自由的真象。英國工人之所以失去組織工會的自由保障，原是由於工人利用工會組織與雇主交涉他們的勞動契約，使雇工集體壓力下接受工人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如此，工會的活動顯然有損於雇主的利潤要求，而且危及了雇主的財產權；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工會的活動更屬破壞了契約自由的原則。如此，以保障私有財產制度為基本目標的法律，必然要犧牲勞動階級的結社自由。美國的例子也說明了美國憲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的自由；「非美委員會」所指的美國利益，實只是那數百萬富翁們的利益，所謂反對美國利益的思想，實只是反對百萬富翁們利益的思想。

自由主義的偏蔽是如此明顯易見，在理論上無法不為人深致懷疑；在其理論的實踐上，更無

法不爲人所反對。這種對自由主義的挑戰，自然也不是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儘管是在一八一五年到一九一四年的一百年間，自由主義是擁有最高的權威，正展開着廣泛的影響，但這所謂景高權威也只是一個相對的，在他所建立的各個自由王國中，是無時不有懷疑他的各種原則是否真正合理的思想暗流存在着，也無時不有反對他各種原則的力量的挑戰醞釀着。這些懷疑思想來源自甚複雜，有保守主義的，有急進主義的，也有採中庸態度的修正主義。但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所遭到嚴重的挑戰，還是社會主義的挑戰。社會主義挑戰的本質，乃在於他深以自由主義理想的實現，只是資產階級的享有特權，而以無產階級爲其特權祭壇的羔羊，社會主義的鬥爭乃旨在糾正這種不合正義原則的歷史錯誤。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思想體系中，社會主義認爲資產階級革命理想的實現，只是將國家政權經封建地主階級之手全盤轉移到產業資產階級之手。國家並非一真正爲社會全體謀福利的組織，而只是一資產階級憑藉以尋求其本階級利益而維持社會秩序，剝削勞工階級的社會最高強制權力。他們否認社會正義的要求能在這種秩序下實現。他們認爲，正如資產階級過去曾推翻封建地主貴族階級獲得統治權力一樣勞工階級也必將被迫起而推翻犧牲其利益的資產階級統治者，以取得國家政權維護其本階級利益。在他們看來，真正的自由革命還沒有實現，而正有待於社會主義的奮鬥。所謂自由國家，只是社會上直接聯繫於經濟權力掌握着的強制權力所「合法化」的對人民大眾之有組織的征服。只有通過勞工階級的革命將經濟權力轉移於社會全體後，則社會全體才能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這一挑戰是非常明白無隱的，就在一八四八軍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聯合起草的「共產黨宣言」發表時，整個歐洲社會正是多事之秋。梅特涅垮台了，「正統主義」破滅了；英國勞工階級的工權憲章運動（Charts Movement）雖然被資產階級與地主貴族階級的同盟力量所暫時屈服，自由黨的自由勞工政策——安撫政策雖然一時可滿足一下疲倦了的勞工階級，所使得英國勞工階級暫復沉默，但這沉默只是暫時的，而且「工權憲章運動」在歐洲大陸所引起的迴響正震撼着歐洲的人心。這真是一個政治上充滿擾攘不寧的年頭，而且在表面的政治要求背後，正有一種新社會理想時時要奔放出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正具體而微地概括了這擾攘不安的真正意義。

不過，這時新的自由鬥爭潮流雖然是揭露了，但自由主義這時還完全居有恩惠的王座。一八五九年彌爾（J.S. Mill）出版他的「自由論」（On Liberty）時，仍是以很堅定地語氣條列出自由主義的各種原則。的確，自由主義所創造的雄厚財富，使他這時正對勞苦大眾作某些讓步的可能，即使這些讓步仍不足以阻住社會主義的膨脹，但至少在一一般民主政治已有比較穩固基礎的國家中可稍微緩和一下革命情緒的高漲。自由主義者總認爲生產手段的私有是正當的；由於他的成就正大，資本主義的新生產方法所造的財富正多，使他對勞苦階級的要求可以讓步，所以他們這種對生產關係的見解也可行通。不過，「共產黨宣言」的出現所帶來的新生力量，總給他們有相當深刻的教訓。因之，着眼於平民利益的進步租稅政策變成了自由主義理想的重要觀念；傳統自由主義總認爲國家對人民課賦總是國民所得的一種損失，現在則慢慢相信資產階級可由國家運用進步的租稅政策推行各種社會政策以平抑勞工階級的不滿。此後，約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就有「社會服務國家」的出現。這種新國家觀的基本原理是雙重的：一方面他重新確認私有財產權的合理而予以維護，同時，也準備爲一般因工資有限致不足以獲得合理生活水準所必需之享受者的利益計，而對因私有財產權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加以調整。

不過，這種調整的效用總屬有限，而且愈來愈不足以適應新經濟情勢的要求了，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主義革命潮流與時日增的澎湃洶湧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三

自由主義在建立的自由王國太着重於資產階級的利潤追求自由了，以致他把全部努力都放在

政治體制的建立，以求社會最高強制權力，追求利潤的努力予以最大的自由，並完全服務於這種利潤目的，以致牠沒有適當地注意到這政治體制所建立的經濟基礎是否真正穩固。自由主義告訴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他們是握有最高主權的人民，並主張國家須為人民主權的希望而服務；但牠不告訴他們，這所謂人民主權實際上是與私有財產權存在着反其密切的關聯。這一事實並沒有為人民所清楚。一般自由國家的人民，他們從所謂「充滿了希望的十九世紀」的浮薄經驗中，似乎相信國家真是一個足使人民不斷獲得物質利益以解除他們匱乏痛苦的有效機關。同時，當科學不斷進步，擴大生產能繼續前進時，在一般人民心目中，自由主義好像真能賜與他們的永遠的幸福。他們相信物質幸福不斷增加當是一個自然法則，他們可從這自然法則的運行中得到大量的物質享受機會。進一步說，他們可憑藉普選權所與的政治權力來獲得物質利益的分派。他們真似相信自由主義者的預言，自由的鬥爭會因人們在投票櫃前得有平等權利的保證而勝利。

人們都忽視了這種權利保證所建立的經濟基礎原是不穩固的；這個經濟基礎是有漏洞的。牠所建立的階級關係使社會分配關係不能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配合。生產工具的所有者為了尋求無底止的利潤而展開了急劇的市場競爭。國內的自由競爭，結果產生了巨大的獨占力量，而消滅了真正的競爭自由，此外更出現了國際間搶奪殖民地的競爭，引出了帝國主義和經濟國家主義；自由貿易的原則被放棄了。在資本主義繁榮期中，經濟制度和牠所有的缺陷還能靠自動調整而繼續運行，但當不景氣到來時，這種自動調整的作用也完全消失了。

而且，給民衆增加物質利益的能力也逐漸消滅了。因「社會服務國家觀」而產生的社會立法和改善勞工生活水準的措施也被不景氣的壓迫而停止了，因為這些辦法的繼續是妨害了資產階級本身的利潤追求。這時，資本主義已開始被迫轉進一個難有迴旋餘地的死巷。

資產階級看得很清楚，日夜伺候在他們背後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胆量愈來愈大，心思愈來愈不平凡，手脚愈來愈不斯文了。自由主義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已愈來愈不足以應付資產階級的安全需要了，無產階級正企圖沿着這道缺口向他們進攻；他們當日躊躇滿志時，正沒有料想到無產階級也會假手於他們自己的政治武器反攻他們，人們必須利用其政治權力以改善他們物質生活的處境，這原是自由主義觀念中所本有的理論。現在，自由主義無論如何不能自動否認這觀念，即是牠不能否認民主政治的存在。資本主義已明白牠正處在很矛盾的家境中：如果牠不放棄自由主義的實行，必自牠陷於毀滅；但如果是放棄了，牠那時仍然沒有什麼安全存在的希望。牠轉進這死巷中後，以前曾出現過的自牠調整和穩定全都消失了。牠遭到了強大的社會主義挑戰，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加强了這挑戰的意義和實力，從此，使牠陷入了恐怖不安。牠了解到社會主義的挑戰是衝擊到自由主義主張的基礎的挑戰。這時，維護這制度的資產階級，也很自然地開始採取了抵抗社會主義挑戰的自衛手段。牠們採取自衛對策，而且很自然地視此為其本有權力。

因為在「合法」的意義上來看，各種防衛對策的採用，確是資產階級的權利。自由主義的各種觀念在近四百年的長時期中，已深入了牠所支配的社會的每一角落。法律、教育、家庭、教會都着上有自由主義的色彩；自由主義本身已成了生息於牠所安排之秩序下，且所受其惠益的人們所習慣了的傳統，牢與一切傳統所具有的權威意識。受其惠賜的人們不單是遵循着這傳統去安排他們的生活，更把牠們所習慣了的傳統制度視為社會的必要基礎。牠們很天真地假定一切對牠們所賴以生存之特殊權益的攻擊，就是對文明基礎的攻擊。於是，牠們把自由主義制度武裝了起來，以對付社會主義的攻擊。

當一個制度為其生存展開戰鬥時，牠即不可能再保留有容忍、討論和理性的機會。防衛這個制度的階級必然要使用一切可能有效的防衛手段。在這場合下，民主憲政的自由理論必成為累贅。從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曾從容坐視牠自身的崩潰，自由主義的政權自然也不能例外；一切自由民主原則的有效存在，也只有當其存在不致危及牠自身安全時才有可能。這發展很明白地反映於

德意法西斯的興起中。

法西斯的興起，本質上是意味着自由觀念的毀滅和保護經濟權力掌握者利益的新體制。當然，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原因頗為複雜；但其活動的目的則非常明顯。他一旦取得國家權力，最初無不是以「國家緊急權力」來破壞勞工階級的一切組織。同時，壓迫法西斯黨以外一切黨派的言論自由和罷工權利。他的興起多半是伴着軍隊和大工業而獲得政權，而在獲得政權後，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完全被剝奪，而仍留不變者則為私有財產權制度，大工業金融巧頭們的利潤機會。總之，法西斯是以沒落期中資本主義的新適應體制的形態而出現。他破壞了資本主義在繁榮期中所容許的自由主義，而將一能產生為大工業家所希望恢復利潤的環境之新社會秩序強使民衆接受。

這同樣的情形也很恰當地反映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我們已無須在這裏詳述自由主義在美國是在如何沒落中的事實，因為那裏的實情已表現得太明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當一九三三年美國資本主義遭遇到空前危機時，羅斯福總統企圖運用美國憲法所給與每一位總統的職權推行「新政」(New Deal)，以復興美國經濟，拯救資本主義以免於美國經濟的全面崩潰。但他的「新政」中一些重要法案均被最高法院判決為違憲。最高法院的違憲判決是反映了美國的大工業和壟斷資本家對任何輕微的改革均不能容忍，認為有損於他們的利潤要求。羅斯福所倡導的新政早已摧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但「新政」的精神已完全消失於美國政治中，而且美國公民的自由權利基礎也已在動搖。前引「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活動，一九四七年剝奪勞工自由權利的「勞工法」(Labou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 of 1947, or Taft Hartley Act)的成立，這些只算是最昭明彰著的例子，證明美國資本主義正在採取緊急的措施以保護利潤制度的安全，這種措施是以自由主義的犧牲為基礎的。

中國海外貿易商經營者之地區分佈的研究

傅衣凌

——中國商業資本集團史論之八——

這一篇短論，爲我研究中國商業資本集團史的副產物，即於搜集明清時代中國商業資本集團的資料時，曾發現到中國海外貿易商經營者的出生地之地區分佈是非常的普遍和衆多。其從事各種海外貿易的活動者，不僅是沿海省份的人民，而一般內地的商人也多有參加此項商業的活動。這一個問題，其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上所發生的影響和作用，是進步呢？抑或是相反的結果呢？這許多問題，都值得我們研究經濟史的人的從長討論的。下面，我想先引述明清時代中國海外貿易商經營者之地區分佈情形，然後再依據所獲資料，發表一些我底意見。

說到中國的海外貿易商人，不用說，其由來已久。據文獻的報道，當唐宋時代，中國的海外交通已見相當發達，那時即有不少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航海東來，集居於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地，在這麼一個情形之下，於是中國商人也多浮海爲生，初則作近海的往返，繼則遠航外海，日本、朝鮮以及南洋各島，都無不有中國商人的蹤跡。就中，尤以沿海的蘇、浙、閩、粵省的商人漸構成隨南方的商業資本集團的中堅，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史裏居於領導的地位。不過，其發展的初期只是附爲賈舶的一種非正常的貿易往來，迨至元明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經濟的成熟，海上交通的越益發達，於是中國海外貿易商經營在的人數，也日見激增，漸漸的擺脫了王家貿易的羈絆，踏上自由貿易的階段。關於其分佈的情形，自然要數及南方的沿海諸省，首先，我們且來說一說江蘇的海外貿易商，從文獻上的記載，江蘇的華亭、江陰、黃姚等處，早是蕃舶出沒之所，爲海商聚居的一個根據地。尤其在宋元之際朱清張瑄的開通海運，交結諸夷，自是吳人的通番求富者，數漸日多。

自元氏海運，用海民朱清張瑄，而瑄子文虎遂以戶部尚書領漕，取路大洋，旬日達於直沽，由是朱張二氏以交通諸蕃貿易，占刈官蘆，販鹽行劫，第宅偏於吳中，……至今吳人有通蕃求富者，址海崇明三沙姦民，多以行販抄掠爲業（黃省曾：吳風錄）。故在元明時代，嘉定、常熟等地的下海通蕃者，時見記載。

嘉定州大場沈氏因下番買賣致富（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七）。

倭……一支寇蘇州常熟，多內地通番奸民，爲之嚮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九，浙江八）。

次於江蘇，則浙江的明州、杭州，自宋元以後即爲浙江省舶司的所在地，故其地亦爲海外貿易商人的所聚。就中，以寧波爲多。如明正德四年來貢的倭使朱素卿，即係鄞人。

四年，倭使朱納卿來貢……素卿即鄞人朱編，少露於夷商四五郎，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境，竊在倭國僞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爭貢要利，沿海奸豪，效尤通番，遂習以爲常云（全上引）。

嘉靖間活躍於浙海的毛海峯，亦爲鄞人。

毛海峯鄞縣人，其父毛柏乃黜退秀才，先因長子毛子明通番，通欠貨物，以父往贖，而後以弟代之（萬表：海寇譜）。